

○殷增涛／主编

武汉

Wuhan
Duiwai

对外开放史

Kaifangshi

武汉市档案馆

编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武汉 对外开放史

DuWai KaiFang Shi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殷增涛 主编

● 涂文学 / 副主编

武汉市档案馆 编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汉对外开放史/殷增涛主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430-3383-6

I. 武… II. 殷… III. 对外开放—经济史—武汉市

IV. F127.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8324 号

主 编:殷增涛

责任编辑:肖德才

封面设计:刘福珊

督 印:方 雷 戴 涌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wuhanpress@126.com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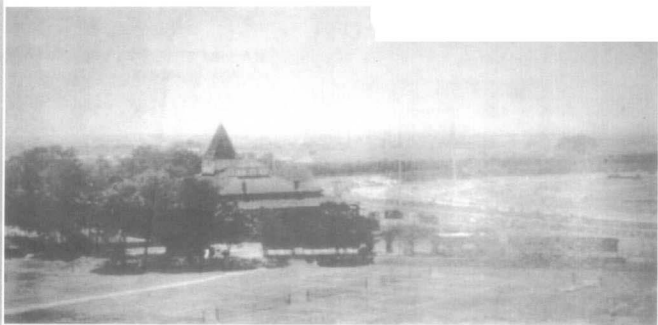
印 张:21.125 字 数:588 千字 插 页:8

版 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汉口西商跑马场，主场地在今解放公园。图中左边房舍为今属解放大道边的武汉话剧院。

汉口租界外滩



一八七二年，英商在汉口设立的砖茶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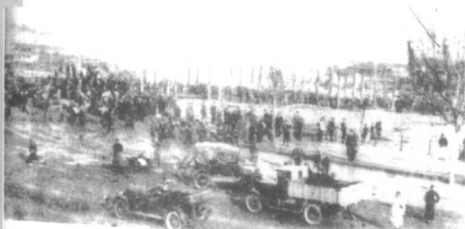


英国汇丰银行（右）与美国花旗银行（左）

江汉关，1924 年建成新大楼，
此为 1931 年江汉关侧影。



1926 年建在汉口近郊田野中的梅神父纪念医院（今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梅神父名 Angoltcus Melctto），医院门前的路东接循礼门，初名梅神父路，今名江汉北路。从前的田野如今已成为闹市



1927 年汉口“一三”惨案发生时，英水兵与中国群众冲突



汉口外国修女休闲织毛衣



洋太太与土轿夫



汉阳铁厂，前临汉江，后靠龟山。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1893 年建成投产，有大小十个分厂，是当时亚洲第一大钢铁联合企业。图为 1894 年 7 月 3 日张之洞视察汉阳铁厂



德国驻汉口领事馆原址



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馆原址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汉口分行原址



英国：汇丰银行汉口分行原址



昔日洋码头 今朝新江滩



汉口江滩欧式建筑群

序 言

殷增涛

《武汉对外开放史》付梓在即，希望能对武汉历史研究和推进城市开放起到积极的作用。

武汉在历史上是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的城市。自 1861 年汉口对外正式开埠通商后，发展迅速，后来居上，旋而“驾乎津门，直追沪上”，“位于清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享有“东方芝加哥”美誉。从“五百年前一沙洲”演变为近代的工商业大都市，武汉的对外开放创造了中国对外开放史上的奇迹，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城市有武汉如此幸运，由一个封闭的内陆市镇一跃而为国际商埠和国际性大都市。

十分遗憾的是，与近代武汉在对外开放中所创造的辉煌相比，理论界和史学界对武汉开放历史的研究相对较少。据有关专家介绍，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全面、系统、完整地研究百年来武汉对外开放历史的专著。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也鲜见专门论述一个城市或地区对外开放历程的著述，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先试验、起步的，武汉 1992 年才批准成为沿江开放城市，这样在开放上比沿海地区晚了十年左右。发展与开放紧密相连。进入现代，曾经领开放之先的武汉开放滞后了，我认为这是武汉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8年,我在市政府分管开放工作时,就产生了研究武汉开放史的念头。和刘传铁、聂建新、涂文学等同志说了这个想法后,得到了他们的响应和支持。在大家的努力下,方有今天《武汉对外开放史》一书。

综观百年来武汉的对外开放史,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

一为后来居上。近代武汉的对外开放比上海等沿海城市晚了20年,但晚发早至。1861年汉口开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超越天津、广州,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要港。

二为被动与主动矛盾交织。在近代中国被迫、被动开放的大背景下,武汉开放中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相互交织、互为矛盾,前者甚至大于后者。城市以认同的心理迎接和融合外来文化,传统商业很快与国际贸易接轨。特别是张之洞督鄂后,先后引进国外管理人才和先进技术兴办厂矿,自开武昌商埠与洋人争利权,鼓励商战,扩大对外贸易,大兴文教事业,充分体现了开放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三为多领域、多方位。当时,开放不仅体现在对外贸易领域,在航运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尤其是体现在市民的对外开放的观念、心态层面上。他们追新求异,耳濡目染开放过程中的风风雨雨,市场意识开始形成,现代市民意识开始凸现,加快了城市的发展进程。

当然,与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所实行的对外开放不同,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开放史是一部充满屈辱和痛楚的历史,打上了深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烙印。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外国资本的进入,催生了一批民族工业,启蒙了国民的市场意识。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推进中国现代化绝不是外国侵略者的本意,相反,他们采取了种种遏制的措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举步维艰。大势如此,武汉自难例外。

在研究武汉的对外开放历史进程时,有几个问题常引起我们思索,并且希望能找到解答问题的初步答案。为什么西方殖民主义者将武汉纳入其在中国猎取利益的重要战略目标?为什么武汉在开放中后来居

上？武汉在近代中国被迫开放的总体格局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原因何在？为什么武汉在经历了清末民国初期的短暂繁荣后开始走下坡路，“东方芝加哥”辉煌不再？等等。这些问题的探索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书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以期对当今的对外开放实践有所借鉴，并作为学术研究的引玉之砖。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方兴未艾，武汉的对外开放成就斐然。如果将武汉的对外开放放在“中部崛起”的战略背景中分析思考，我们对已取得的成绩不仅不能沾沾自喜，而且深感压力巨大。作为中部地区的唯一特大城市，开放则兴，封闭则衰；大开放则大发展，小开放则落后。武汉理应在新一轮的大发展中构筑高起点、高水平的开放格局。

了解武汉的对外开放历史，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国的对外开放历程。《武汉对外开放史》成书虽然晚了一点，但通过梳理百年来武汉对外开放的历史脉络，把握武汉对外开放历史进程的发展轨迹，相信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开放和发展关系的认识，成为研究武汉开放和发展的有益史料。

导论：开放，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引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汉口，在海内外的名声远比现在要大得多。人们普遍认为，至迟在 1900 年，汉口就已获得“东方芝加哥”的美誉。1902—1911 年的江汉关《海关十年报告》曾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汉口是人们普遍公认的中国的芝加哥”^①。但美国知名汉学家罗威廉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西方人便对汉口和汉口人的“世界性”已经有所感知^②。这似乎表明，汉口对外来事物和外来文化有某种先天性认同，因为汉口获得具有“世界性”的称誉距离开埠只有 20 年的时间。这条从海外传来的迟到信息不仅引起我们追忆汉口对外开放史的兴趣，而且引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深处堂奥的传统商业市镇能够那么积极地应对来自遥远的西方经济与文化的挑战，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贸易结构乃至城市功能的现代转型而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国际性城市，原因何在？

一、在沿海与内地之间：武汉对外开放的非典型性

在古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地理版图上，沿海与内地的人文色彩是有

① 《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1882—1931）》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1993 年，95 页。

② 参见戴维·希尔（David Hill）：《中国湖北：它的要求与呼声》（纽约，1881 年），1 页。

所区别的。有学者将其分别称之为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对这种过于概念化的观点我们虽然持保留态度，但内地与沿海社会和文化形态呈现出来的某种差异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古老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官僚社会，而且也是一个家族制的和根植于土地之上的社会。它既不同于人烟稀少的中亚地区，也不同于具有更大流动性的边缘航海地区”^①。与内陆农业社会固着土地、重农轻商不同，海洋的流动性使沿海社会表现出冒险、贸易，向外拓展、海外殖民等诸多有异于中原大陆文明的“次要传统”，这些“次要传统”，对于习惯于传统宗法专制政治统治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来说，不是可资利用的社会元素，而是问题和危机。因此，总是想方设法将其纳入内陆——农业文化传统系统之中，予以同化，改造。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对于官员们说来，海洋意味着问题，而不是机会，他们的治国之策，如果在岸边还算有益，那么在海上却肯定失效了。保甲及别的注册和控制技术；工事、要塞和海岸警卫部队；以及政府对官办造船厂的管理等乃是他们的关心焦点，中国航海家们关于大海彼岸地区的丰富知识在对付政治手段方面一筹莫展。”^②正是由于沿海和内陆流动与固定、商业与农业、开放与封闭、冒险与因循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差异，使中国历代统治者在治国方略上确立起重内陆、轻沿海的价值取向。内陆性地理特征从心理上给人们带来防卫上的安全感；其悠久的农业文明和严整的家族—宗法—皇权制度，让统治者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感。而沿海，那里不仅是边缘蛮荒之地，还是充满未知和变数、不测和危机的是非之地，远不如中原腹地那么能得心应手便于统治。在朝廷看来，沿海是罪臣最为理想的流放地，是需要教化的蛮夷之区。再者，自古以来国家的安全危机主要来自北方和西北地区，东南沿海除明朝中后期闹过一阵倭寇危机外，一直平安无事，这也是历代王朝忽略海洋经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种传统的“次要性”或

①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3页。

② 小约翰·E·威尔斯：《从王直到施朗的中国沿海：边缘史问题》，215页。转见费正清上引书，20页。

者异质性,导致了封建统治者对沿海的放弃,而放弃的结果是更加强化了沿海与内地的种种差异——文明的“次要性”和“异质性”。对此,美国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权威作品《中国的现代化》有过精辟分析:“内亚大陆在明、清政府战略决策中的首要地位,也可以根据海洋中国与大陆中国之间或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别来加以分析。费正清提出,创造帝国传统并在制度上完善了农业社会和官僚秩序的是大陆中国。而海洋中国则向南发展,其商人深入到东亚和东南亚沿岸海域,发展起遍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网络,扩大了商业资本,并置贸易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在13世纪最初30多年的一个短时期内,当明朝宫廷委派郑和进行了几次远航之时,中华帝国影响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普遍扩散似乎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首要考虑所在,但随着政治潮流的改变,内亚大陆的国境和军事安全再次恢复了其传统的首先应当关切的地位”。“中国世界观中的所有这些因素,诸如对落后邻国在文化和规范方面所抱的优越感,对外界观念和货物的自觉排斥和蔑视,面向其内陆腹地而非其沿海视野的农业官僚政体,等等,使中国不太可能像日本在1868年所宣称的那样,将‘拓新知于海外’”^①。

从城市史的视野来看,沿海城市的边缘性同样十分明显。作为一个内陆型的农业社会,中国传统的区域和城市战略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对沿海城市进行封闭式管理,即实行所谓“海禁”,清代只有广州“一口”对外开放;二是“偏重于在内地构筑其城市体系,沿海城市体系一直不发达,在传统城市结构体系中处于无足轻重的边缘性地位。”^②中世纪中国著名的城市几乎都是内地城市,尤其是中原城市和北方城市。尽管宋元时期,出现过泉州、广州、杭州等蜚声海内外的沿海大城市,但成就它们的只是某种特殊历史机缘。杭州不过是南宋的偏安之都。广州在清代之所以被允许为唯一的开放城市,正是因为其僻处岭南,与中原大地重重阻隔的地理位置。著名美籍口述史学家唐德刚在谈到清代广州这种“一口通商”情形时说:“在结束鸦

①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30、32、33页。

② 《涂文学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210页。

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缔结之前，中国所搞的‘外贸’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国货物——如苏杭宁的丝绸，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红茶、漆器，安徽的绿茶，长江下游的棉纺织品等等——销行欧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岭，通过广州‘一口’去漂洋过海的。欧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银，英国的呢绒、钟表（且看北京故宫的‘钟表馆’）和后来的鸦片，美商所运的檀香、人参（所谓‘西洋参’有别于东北产的‘高丽参’）、皮货等等，乃至南洋产的珍禽异兽、犀角象牙……也都是通过广州逆流而行畅销于内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贸’都要在广州一口去参加变相的‘广交会’。中方出口贸易则由专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个独立商号）加以垄断；番禺《竹枝词》所谓‘金钱堆满十三行’是也”。“我国当年‘广交会’的贸易额是可惊的。在伦敦、纽约等现代港口兴起之前，广州可能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纪的泉州不相上下”。尽管如此，广州当时对内地的影响远没有今天这么大，因为朝廷采取严格的措施阻止和减小广州的开放对内地其他城市的影响。即便在经济领域，广州的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和影响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当时，“中国管制外贸关卡，则有所谓‘粤海关’，年入正税约在80万两上下（税收略次于长江中游的‘九江关’）。粤海关不属于‘户部’（今之财政部），而直辖于‘内务府’，是皇帝的私产。关税收入作为北京禁城的‘维修费’”^①。因此，清代前期的广州对外是一个联系畅通的开放城市，但在整个中国城市系统中则可能是一个孤岛。

内地城市与沿海城市相互影响的颠覆性变化是在晚清发生的。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版图，国家防御的重心由一向重视北方和西北大漠而转向东南沿海；而且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国家安全观念以及城市发展与布局观念。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沿海城市既是最早的受难者，也是最先的受惠者。“五口通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最早被迫开放的城市，都是沿海城市。在“五口通商”的刺激之下，东南沿海城市获得长足发展，

①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71—72页。

其中最为典型者莫如上海，短短二三十年内，便从东海边的一个蕞尔小邑崛起为东方第一大会都。清代前中期，上海被人称为“小苏州”，然而到了晚清，苏州反而被人们称之为“小上海”了，地位转换发生在须臾之间。上海创造了中国城市迅速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奇迹。由于国防和经济的双重关系，沿海城市体系开始建立，“在粗具雏形的近代城市体系之中，传统政治性城市的中心地位逐渐失落，经济中心城市尤其是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取而代之成为城市网络的纽结点。如天津到清末迅速上升为华北城市网络体系的中心位置，上海不仅成为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的中心，而且是连接南起广州、香港、澳门、福州，北到青岛、天津等沿海城市 and 上至宜昌、沙市、汉口，下迄九江、芜湖、镇江等沿江城市的近代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其他如福州、广州在东南、华南城市网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中心位置”^①。

近代中国沿海城市通过贸易、租界等多种方式和途径，直接或间接地感受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城市也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在西方现代精神的熏陶下形成了新的社会风气和城市精神。“通商口岸贸易的发展为中国带来了新的交通和工业技术，新的有关外族的知识，同时也促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精神”。“中国的海上联系方式不仅成了西方入侵的渠道，而且也将一种新的中国领导方式引入上海、天津、九江、汉口等新兴口岸城市。越来越多的学生涌向日本和西方，探求拯救自己祖国的道路。在那里，他们脱离了中国士大夫阶级通常与之紧紧相连的乡土背景。中国的新的现代派一般都失去了他们的农业之根。最后，这种联系许多都绝灭了”。

随着沿海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沿海城市体系的逐步形成，沿海社会与文化在整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边缘性地位不复存在，开始以一种新型的甚至主流文化的姿态对内地社会与文化发生影响，近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变革都发祥于沿海城市——广州和上海；近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先进人物都出身于沿海，或者有沿海游历的履历，从林则徐、徐继畲到王韬、郑观应，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郭士力和

① 《涂文学自选集》，211页。